

汉武帝时期“王者无外”边疆思想重构的动因与路径^{*}

袁宝龙

【提要】汉初以降，汉代“黄老无为”边疆思想的弊端日益显现，无论基于现实抑或理论视野，探索和建构新的“有为”边疆理念均成为一种时代需求。经汉初以来的发展与积淀，边疆思想嬗变的时机成熟于汉武帝执政时期，汉武帝和董仲舒成为推动嬗变最终完成的两个关键性人物。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理论为汉武帝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引领和理论框架，长期存在的夷夏互化等一系列现实及理论困惑因此迎刃而解。汉武帝审时度势，圣心独断，以新儒学的积极态势来建构汉代边疆思想体系，强化集权，外事四夷，从而开启了西汉中期的边疆“大有为”时代。

【关键词】“王者无外” 边疆思想 重构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9)06—0122—13

汉武帝执政时期，西汉王朝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成就均步入鼎盛时期，儒学复兴成为这一时期学术进展的显性特征，并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因。当时的夷夏观念以及边疆策略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议题：一方面，华夏族群的内部整合与外部融合进入到深度阶段，其所聚居的中原之地逐渐成为以夷夏二元制天下为重要特征的文化中心，文化层面化育四夷的需求应时而生；另一方面，夷夏之间的深度接触日益频密，汉初确立的消极边政弊端日显，这又成为边疆思想转向的现实性因素。在“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与推动下，二者最终成为“王者无外”边疆思想于汉代复盛的理论与现实基础。^①也可以说，随着汉初以来社会发展和学术思想的演进，“黄老无为”治国哲学渐成已陈之刍狗，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这一点在边疆经略的顶层设计与事务处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汉代“华夷共祖”思想的兴起与华夏中心的观念确立后，为先秦儒家所不胜向往的“王者无外”思想自秦代以后再次迎来于边疆层面复振的契机，汉武帝“大有为”时代边疆思想的建构之路遂由此发端。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秦汉边疆思想研究”(19FZSB026)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华夏之人将自己的优越文化向外推展，使夷狄之人也沾染德教，而华夏天子的声威仁爱所及，是不受区域限制的，应“以天下为家”。参见龚留柱：《“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南都学坛》2000年第4期，第1~5页。

一、汉初华夏谱系的构建与边疆思想嬗变的理论前提

(一) 汉代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西汉边疆思想“有为”与“无为”的主旨嬗递完成于汉武帝一朝，秦代初试牛刀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遂得于汉代复振，并由此确立了汉武帝时期波澜壮阔的宏大边疆战略。这种历史转变在最终实现之前，经历了长时期的酝酿与积淀，以坚实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为基本前提。在此过程中，汉景帝朝的“七国之乱”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改变了最高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与理政倾向。如果说，此前的西汉统治集团尚且坐视王国坐大的腹心之疾而犹疑不决，那么就在“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意识到王国问题的严重性，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整顿措施，如废弃叛乱诸国，大力推行削藩之策，“令诸侯不得治国”，即限制诸侯国的政治及经济权力，此后诸侯王再无力与中央相抗衡，王国问题基本得到解决。^① 因王国势力式微而衍生出的新问题，是中央王朝势力所及的边界延伸至夷夏边疆，与周遭四夷势力直接接壤，汉代边疆格局因此为之一变。

汉初以来，在“黄老无为”精神的引领下，边疆经略以“和亲”等非军事手段为主要的实施形式，并基本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局势平稳。然而，就在消除诸侯国潜在威胁的过程中，西汉王朝逐渐意识到以“无为”理念治国理戎之弊，遂开始以积极态势来处断边疆事宜。也就是说，中央朝廷的权力触角向外延伸至边疆区域，意味着集权式中央帝国的管理模式与原有“无为”理念主导下的夷夏相安格局的矛盾已然无处遁形，这种观念上的剧烈冲突终于在汉武帝时代以“黄老无为”思想的衰微和“王者无外”思潮的复兴表现出来。

汉武帝登基之时，汉朝已经多年的休养生息，物阜民丰，国力大振：“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② 这样富足充裕的物质基础，使“有为”思想的形成与实践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又在催促着“有为”理念在理论层面的进一步求索与升华。尤为重要的是，在汉武帝时代，强大的中原农耕文明体系已经越发表现出鲜明的优势文化特征，夷夏之间的文化差距越来越大。而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又使基于汉人视角的夷夏观念产生了这样一种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一方面，中原之人有着作为卓越文明创造者的优越感，鄙视戎狄文化；另一方面，又把传播文明以化四夷视为己之重任，试图以优势文化化育四夷。黄朴民先生指出，汉代的民族观大多依违于“别夷夏”和“进夷狄”两端之间，但是主流的民族思想则超越了族群概念与地理畛域，试图使夷夏民族皆以先进的中原文化为鹄的，使四夷摆脱贫蛮，趋近文明，从而实现不同民族的大融合。^③ 也就是说，在两种文明双峰并峙的情况下，儒学的日益昌盛使西汉之人产生了更高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就是先秦诸子对“大一统”的不懈向往在汉代边疆经略上的现实回响。

文景之世，随着边疆形势的演进转变，持不同主张的边疆思潮风云涌动，交相争鸣。这种转变的趋向必然与现实世界中夷夏关系的张弛缓急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当此之时，以守文之主著称的汉文帝也屡生兴兵征伐匈奴之意，只不过在“无为”边疆理念占居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想法终究未能成为现实。汉武帝执政初期，出于对西汉边疆传统的尊重，亦与匈奴“明和亲约束，

① 唐贊功：《吴楚七国之乱与西汉诸侯王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第32页。

② 《史记》卷30《平淮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0页。

③ 黄朴民：《“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49页。

厚遇，通关市，饶给之”。^①但是，在西汉王朝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厚、汉文明的文化优势越来越明显的时代视域下，重新构建“王者无外”边疆思想逐渐成大势所趋，有其必要性，亦有其必然性。

在汉初学术复兴的风潮中，贾谊是批判“黄老”、力主“有为”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惄渠颇率天子之民，以不听天子，则惄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有休人之民哉。”^②亦即是说，但凡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蛮夷戎狄，皆为天子之所，这是先秦时期“王者无外”思想的理论范畴。贾谊对汉初制定并延续至今的“和亲”之策予以强烈批判，指责汉匈“和亲”有首足倒置之嫌，进而提出了“三表”、“五饵”之说，^③作为德服四夷的策略手段。贾谊关于边疆经略的诸多主张，皆有强烈的指向性和现实性。可以想象，汉武帝在登基之前，必然深受当时的思想家们关于“有为”与“无为”理念激辩的影响，这种思想争鸣也必然会成为他日后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来源。

事实上，改变黄老之风盛行的“无为”局面，绝非贾谊、汉武帝的个人主张，而是汉初创基以来发展六十余年之后整个社会的共同期待。毕竟“无为”理念严重地束缚了社会进步，举国上下皆墨守成规，毫无进取之心，已经难以满足汉王朝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需求。随着西汉政权日益稳固，儒者走上政治舞台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王者无外”思想复振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均已于此时奠定。

（二）夷夏谱系的整合与“华夷共祖”思想的产生

汉朝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就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完成了对中原华夏族群谱系的重新整理与再度建构任务，从而有力地加速了汉民族的形成进程。

秦代以前，华夏始组谱系相对混乱，虽然同为黄帝世系，但《世本》与《山海经》所载颇有差异，这也反映了不同地域和阶层的华夏族群在构建华夏谱系时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作为秦统一后华夏族的存在形式——秦人群体亦未被纳入至黄帝谱系之内。^④秦短祚，二世而亡，不过秦人作为由华夏族到汉民族的重要过渡阶段，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直到汉王朝重新实现了华夏族群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重新构建完整的华夏世系这一历史重任，遂由司马迁等汉人完成，其成果就体现《史记》之中。^⑤司马贞认为“且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赐姓，或于蛮夷”，^⑥这首先为夷夏同出一源奠定了基本前提，使以黄帝为夷夏共祖来建构华夏谱系的浩大工程成为可能。

匈奴作为与西汉关系最为密切的四夷部族，司马迁称其为夏后氏之苗裔，其余夷狄的源头也均归结至华夏体系之内。把四夷与华夏纳入同一世系，可以视为完成了重构华夏世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对《世本》《五帝德》等既有成果的继承与改造，对华夏世系进行了全面重构，从而把原本归属于不同族群的各代帝王均纳入黄帝世系。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世系确立之后，也就意味着当时庞大的华夏族群具有了共同的文化渊源，并因此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员个体之间拥有了互相认可的族群意识，夷夏观念也随之逐渐明晰起来，并将对西汉王朝的边疆决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页。

②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4《匈奴》，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9页。

③ 《新书校注》卷4《匈奴》，第135~137页。

④ 此处的“秦人”指秦统一之后，由原秦人与六国之人共同组建成的新“秦人”群体。

⑤ 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页。

⑥ 《史记》卷13《三代世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7页。

需要指出的是，先秦以降，基于华夏视角的华夷之辨思想曾长期存在，并且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华夷两大群体的交流与融合。正是由于秦汉王朝率先奠定了中央集权君主制政体下的大一统格局，才为司马迁“华夷共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现实可能。作为公羊学大师，汉儒董仲舒全面继承了《公羊传》的思想，并成为把《公羊传》发展为公羊学的关键性人物。^①而与源自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思想相比，经秦汉之际的整合与转向，汉代公羊学的夷夏观念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态势：除执守攘夷之本旨，还进一步肯定以夏化夷之举，以礼仪品行而非族群血统作为判别夷夏身份的最高原则，成为这一时期族群理论探索的重要收获，这又为“华夷共祖”观念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华夷共祖”的思想既是秦汉时期政治大一统格局下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可映射出当时华夷融合的历史现实。^②

从其族群主张与理论特征来看，“华夷共祖”无疑是一种开明开放的夷夏观，华夏族群对于四夷的认可是当时“王者无外”思想复兴的理论前提。有学者指出，司马迁的民族观包含两个部分：认可夷夏同源，诸族之间血脉相连；但又强调夷夏有别，推崇尊卑不同的华夏中心观，认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司马迁一方面为“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复兴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为边疆思想的“有为”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司马迁对华夏谱系的重构，适逢西汉边疆思想从“无为”向“有为”嬗变之际，并成为汉武帝“大有为”思想的时代注解。

概而言之，在汉代，庞大的多民族共同体拥有了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文化谱系以及共同的经济生活方式，通过长时间的互相融合，华夏族群具备了共同的文化理念和精神信仰，作为民族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此时的汉王朝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形成了自身的文明体系，同时实现了文化、地理与经济三条边界的重合。“华夷共祖”思想的产生，使秦时“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借助儒学独尊的契机回归成为可能；诸族一统于华夏的思想，又极大地刺激了边疆经略的主观积极性。这种理论层面的重大变革，终于促使古代中国的边疆思想迎来了重大的嬗变转折期。

二、“王者无外”边疆思想体系重构的历史契机与现实动因

(一) “百越之争”映射下边疆思想的“有为”与“无为”之争

汉武帝朝，南方诸越屡有纠纷，西汉中央政府对于如何适当地处理夷夷之间的争端问题屡屡引发争论，分持固守传统与力主革新两种边疆主张的群体之间就此展开了激烈论辩，这一时期边疆思想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亦可于此时的论辩中略见端倪。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受困于闽越，乃求援于汉。时宰相田蚡力主不救，汉武帝未从其议，卒使严助发兵会稽，浮海救之，最后“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④三年之后，闽越与南越之间又起纷争：“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踰领，闽越王郢发兵距险。”^⑤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此事，不过刘安书至之时，汉军已发。适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军乃罢。

① 汪高鑫：《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南开学报》2006年第1期，第88页。

② 王文光、翟国强：《“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第3页。

③ 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42页。

④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0页。

⑤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81页。

前述两事皆发生于汉武帝大举外事四夷之前，此时“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重构尚处于酝酿筹谋之中，亦是新旧两种边疆思想潮激辩方炽之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刘安与田蚡二人大致代表了传统守旧的边疆理念，即汉初以来确立的以黄老道为核心要义并杂糅了其余诸家之学的“无为”边疆思想；严助以举贤良为武帝所赏识提拔，属于汉武帝阵营，他的边疆主张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武帝的革新派边疆理念。双方的争辩，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关于夷夏关系的交通或封闭问题。“无为”边疆思想基于“黄老无为”思想构建而成，并吸纳了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对四夷之人融入华夏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刘安为武帝时代传承黄老之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主编的《淮南子》更堪称黄老道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刘安强调夷夏大防，始终坚称华夷之间的文化差别是不可逾越的。刘安认为，五服之间“远近势异也”，且称：“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①《淮南子》亦称：“越王勾践翦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②关于吴越文化的落后及其与华夏文化的差距，战国时期已有类似表述，赵武灵王称：“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面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③刘安之所以承其旧说，其实就是在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之防，并把华夷的内外隔绝视为上天之意：“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④既然天意如此，那么四夷之事，华夏自然无须介入。事实上，刘安认为夷狄相攻并不在九州范围之内，中原出师并不能获得传统理念的支持，因此他认为百越“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⑤为表明自身理论言之有据，刘安复援引前朝旧事加以佐证：“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⑥传统“无为”边疆思想是黄老道在边疆经略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在构建过程中逐渐吸纳了夷夏之辨等理论在内的诸多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与刘安的观点类似，田蚡亦以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⑦田蚡亦曾近于儒家，不过他所近之儒为鲁学，所传承的是传统儒家学术，故其在边疆理论上与刘安主张的黄老之学有相似相近之处。在新旧思想争鸣方炽之时，这种因相近观点而形成同盟的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汉武帝即位之初，“东越相攻，上使（汲）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⑧汲黯亦属当时保守派的重要代表人物。^⑨由汲黯到刘安、田蚡，尽管分属儒道不同阵营，但正因为他们均在边疆主张上强调夷夏之防理念，故而在关于边疆精神选择的论战中结成了战略性统一阵线。

其次，在对待边疆之地与边疆之人的看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前述的理论基础上，刘安进而

① 《汉书》卷64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7页。

②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11《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81～783页。

③ 程夔初：《战国策集注》卷5《赵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④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1页。

⑤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8页。

⑥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7页。

⑦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80页。

⑧ 《史记》卷120《汲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05页。

⑨ 《史记》卷120《汲黯列传》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非，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令天下骚动，疲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史记》卷120《汲黯列传》，第3105～3109页。）

提出少数民族为无用之人、边疆为无用之地，这也是基于华夷无法互转的传统逻辑下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① 因夷狄无用且无法与华夏互转，故拓边之事于华夏而言并无意义。对于边疆之地，刘安认为“得其地，不可郡县也”，^② 又称：“夷狄之地何足以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③ 此外，刘安认为，华夏之人也难以适应边疆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且越人绵力薄材，……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又称：“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④ 凡此种种，其实是为了佐证自身观点而对边疆形象的一种丑化。刘安对于边疆的看法，在《淮南子》中有着更为直观的体现。《淮南子》所描述的边疆“地域”形象明显加入了人为因素，以对“夷狄”所居边疆地区有意识的贬低为基本特征。这种错误描述，又必然会对边疆经略产生消极影响。^⑤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维护传统的“无为”边疆思想，就是《淮南子》成书的目的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汉元帝时，时人贾捐之亦曾如是评价边地：“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顼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厔有珠犀玳瑁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⑥ 元帝之时，已是儒术独尊七十余年之后，当时的保守派的思想犹活跃于庙堂之上，建元年间适值新旧思潮完成嬗递的前夕，传统思想在西汉社会中的影响之剧自然可想而知。

面对保守派的说辞，汉武帝首先表明建构“有为”边疆思想的必要性。他声明自己身为天子，自有天赋治边之责：“夫以眇眇之身，托于王侯之上，内有饥寒之民，南夷相攘，使边骚然不安，朕甚惧焉。”对于淮南王的过誉之词，汉武帝称：“今王深惟重虑，明太平以弱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服，藐然甚惭。”^⑦ 此虽谦逊之辞，也可见他对“人迹所及，咸尽宾服”这一理想远景的认同，以强调自己干预“南夷相攘”之事的理论依据。

汉初贾谊曾以头足为喻来看待天子与蛮夷之间的关系，虽然贾谊强调二者的尊卑秩序不容更改，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蛮夷作为天子臣民存在的合理性，这一观点随着儒学昌盛而得到持续的阐发延伸，于武帝之世已具较大的影响力。作为武帝阵营的重要谋士，严助声称天子对夷人之难断无坐视之理：“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⑧ 严助之言意在表明天子“子万国”之义，此处“万国”自然涵盖夷夏，故汉朝中央不能对四夷之事置之不理，表现出对于经营四夷的积极态势。

事实上，两个阵营争端的焦点就在于边疆理念的“有为”与“无为”：传统思想强调夷夏之别，力主“无为而治”；而汉武帝、严助则欲反其道而行之，构建“有为”的边疆思想体系。后者意味着于夷夏之间建立密切联系，与汉武帝苦苦求索的“大一统”思想理念相切合。当此之时，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已臻大成，儒学独尊亦随着汉武帝对“大一统”理论的思考日益成熟已有呼之欲出之势，只不过此时距离两人的首次会晤尚有一年，缺少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支撑，汉武帝

①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77 页。

②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78 页。

③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85 页。

④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81 页。

⑤ 刘祥学：《地域形象与中国古代边疆的经略》，《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3 页。

⑥ 《汉书》卷 64 下《贾捐之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34 页。

⑦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86 页。

⑧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76 页。

的“大一统”理想也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实施路径，这也是这一次廷辩最后无果而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夷夏格局的理论想象与四夷来朝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无为”边疆思想并不排斥四夷来朝，即便在“黄老”之学充斥整个社会的西汉初期，高昌文景诸统治者对匈奴、南越、朝鲜等诸夷事务的处置，也皆以诸夷臣服、边疆宁靖为最高追求。只不过，“无为”边疆思想坚持认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方式是以德治感化而非兴兵征讨，这也是传统儒学对于夷之入夏消极态度的现实反映。刘安如是描述理想中的皇朝盛景：“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近者亲附，远者怀德”，^①“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响应。”^②“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③可见传统边疆思想的终极目的与革新一派亦有相似之处，二者争议的焦点实际上主要在于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手段。

刘安反对兵戈之事，一方面他认为不可轻言边疆战事：“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④一旦开战，边民必然大受其扰，成为守旧派最常用的说辞。另一方面，刘安认为夷夏彼此相安无事为边疆实践的最优选择，越人并不会威胁中原，而中原亦不宜主动发兵征之。他称：“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⑤并强调兴师征讨的难度：“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桥而逾领，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⑥刘安复引故南海王反故事，描述兴师征讨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惨败局面：“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⑦进而，又以秦时之事为例，称发兵拓边或致其亡国之难：“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⑧对于边疆征战之艰难的描述同样见于《淮南子》：“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⑨在守旧派口中，以秦人兵锋之利，陈兵五十万，犹须三年苦战，方得靖边，今时今日用兵四夷的难度之大、成本之剧可想而知。当然，

①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7页。

②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4~2785页。

③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2~2783页。

④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0~2781页。

⑤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1页。

⑥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9页。

⑦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9页。

⑧ 《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3~2784页。

⑨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11《人间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89~1290页。

考虑到刘安的保守派身份，此中的描述或有夸张之处，亦未可知。

对此，严助率先认为，用兵与德治其实并不冲突。如果可以通过道德手段实现四夷来朝，那么自然可弃兵戈而不用：“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最终“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①这便是德治之收效。其次，严助立足当下，阐明了当今之世边疆用兵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用兵平边，乃是以道德化之无效的第二方案和唯一选择。当局势混乱之时，德治无以施其效，非用兵无以平靖边疆：“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仰治”，^②作为天下宗主，汉廷在必要的时候自然可以通过刀兵来安海内之望。汉武帝也承认“兵固凶器”，故干戈之动，其对象必为穷凶极恶之徒：“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③在此处种情况下，兴兵伐之方为长治久安之计。可见，新兴的边疆思想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军事征伐与道德感化并重的二元制边疆经略理念。

这次论战充分地体现出“有为”与“无为”两种边疆主张的观念差异：传统的边疆思想固守“无为而治”的经略理念，力主坚守“夷夏之辨”的基本原则，任由四夷自生自灭；“有为”边疆思想则欲以德、力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子万国”的政治理想，且明确表明了汉武帝的开边梦想以及为达此境所必须的途径选择。德、力结合的实质是以德为表象，以力为实用，这说明至少在完成自身的德治形象建构上，需要借助“大一统”理想之外的理论支撑。正是在这样的理论需求下，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家之学即将以无比豪迈的姿态步入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舞台中央。

三、“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确立与践行

（一）对匈战略的转向与“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初步确立

西汉王朝所面对的四夷之中，以匈奴的实力最强，威胁亦最大，故汉武帝朝的边疆经略基本以对匈政策为核心议题，其余诸夷在战略思考中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说，对匈奴集团的经略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边疆思想体系的总体趋向。

汉武帝亲政之后，针对匈奴采取“和亲”抑或“征讨”方略的问题，曾有过两次廷议论战。论战双方主要为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王恢。王恢为燕人，“数为边吏，习知胡事。”^④韩安国以行贿武安侯田蚡得为北地都尉，闽越、东越相攻之际，韩安国曾与王恢一同共赴前线。从生平履历可见，二人皆精于边疆之事，两人的观点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战、和两派的对匈战略主张，也代表着“无为”与“有为”思潮在现实中的激烈碰撞。

首次廷议发生于建元六年，时“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王恢以为，匈奴与汉“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韩安国则提出了不同主张，他认为：“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广，有其众不足

①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88 页。

②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87 页。

③ 《汉书》卷 64 上《严助传》，第 2787 页。

④ 《史记》卷 108《韩长孺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61 页。

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疲，虏以全制其敝……击之不便，不如和亲。”^①王恢认为“和亲”已经全无制约匈奴之效，无法保障边疆的安宁；韩安国坚持认为出兵征讨有几乎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仍坚持“和亲”之议。两人针锋相对，各持己见，最终以汉武帝以“群臣议多附安国”，遂许“和亲”。值得注意的是，韩安国与田蚡系属朋党，田蚡是保守派边疆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次廷议发生于建元六年，时窦太后初崩，田蚡为相，权势正盛，故群臣多附其议，武帝从其所请，也在情理之中。

两年之后，即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上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②以此事为契机，遂有第二次论辩，而正是此次论战宣告了汉代征伐思想的正式确立。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汉武帝于廷辩之前率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③汉武帝的这一决定以汉匈关系因匈奴屡屡侵扰边疆而日益紧张为现实背景，在传统的“和亲”方式几乎任何效用的情况下提出。“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④由于汉武帝已经表态在先，故此次廷辩的问题由是否接受匈奴的“和亲”之请改成是否应发兵击之。

论辩双方的代表人物仍是王恢与韩安国。王恢以为如今形势，利于武力征讨：“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輶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⑤韩安国仍以高、文二帝旧事为辞：“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⑥他意在表明，汉自高帝以来，世世与匈奴“和亲”，非独实力不及对方，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征伐成本太大，汉室诸帝惟恐疲耗天下之故。他坚称：“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吉语，重作事也。”^⑦建议武帝延袭高祖、文帝之政，不可轻易祖宗之策，表现出了“黄老无为”理念的典型特征。

对此，王恢以为：“高帝身被坚执锐，蒙雾露，沐霜雪，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竟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槽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臣故曰击之便。”^⑧半个世纪以后的盐铁会议上，时武帝已歿，诸大夫在回顾前朝旧事时亦称“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贿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⑨换言之，王恢以为，高祖文景之时汉匈关系远较现在缓和，匈奴对边疆的骚扰亦不及如今频繁密集。当此之时，边乱不止，生灵涂炭，而从既往经验来看，匈

① 《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第2861页。

② 《汉书》卷52《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8~2399页。

③ 《汉书》卷52《韩安国传》，第2399页。

④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8《和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页。

⑤ 《汉书》卷52《韩安国传》，第2399页。

⑥ 《汉书》卷52《韩安国传》，第2399~2400页。

⑦ 《汉书》卷52《韩安国传》，第2401页。

⑧ 《汉书》卷52《韩安国传》，第2400页。

⑨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8《结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88页。

奴唯可武折，难以德怀，故明君仁人，必当以兵戈征之。

此后，双方讨论的问题由是否征伐匈奴上升为对四方夷狄整体边疆经略的顶层设计层面。韩安国依然强调传统“夷夏之辨”的边疆理念：“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其势不相权也。”^①一旦汉军大出，必将面临无数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胜负难料：“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②韩安国认为用兵当如“圣人之兵”，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③此为保守派老生常谈之陈词，其实质就是反对兵戈之事，但其所谓“坐而役敌国”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对此观点，王恢认为时代不同，夷夏理念亦应因时而变：“臣闻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及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④当时汉匈之间的实力对比比之汉初，已经发生了逆转，兴师征讨，有极大的胜算，而且可以彻底解决匈奴边患。

此次论辩，卒以从王恢之议告终，此后遂有马邑城之事。两度廷议，相隔两年，而结果迥异。马邑之谋虽未能成，王恢复以身死，但是武力征讨匈奴的边疆思想已然由此确定。

（二）汉武帝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必然因素

两年间两度廷议，结果大相径庭。此中原由，已有学者做过深入考察，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四点：汉武帝的主观态度左右了当时君臣；王恢的观点更具进取精神，更为汉武帝所赏识；王恢在交锋中处于主动地位；王恢以诱骗为能事，故能骗取汉武帝的支持。^⑤笔者以为，此说固有道理，但并未切中要害。两次结果大异的主要原因当属第二次廷议之时，汉武帝“有为”思想已经确立，此时他大权在握，君临天下，他的个人意见对于最终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此外，田蚡集团已于彼时失势，也是韩安国廷辩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的成熟，征伐之举具备了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凡此种种皆成为促使“王者无外”边疆思想于汉武帝之世完成重构并付诸实践的重要动因。

第一次廷议之际，汉武帝甫以弱冠之年执掌国政，传统派的田蚡为相，势倾朝野，且是传统边疆理念的重要代表人物。不过在对待儒学态度上，田蚡与汉武帝处于同一阵营。田蚡“喜儒术”，与窦婴、赵绾等人“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⑥引发喜好黄老的窦太后的极度不满，田蚡等人因此甚至招致窦太后的驱逐罢免。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喜好儒学的汉武帝亲政，这意味着亲儒势力的重新抬头，田蚡复得重用，重居相位：“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

① 《汉书》卷 52《韩安国传》，第 2401 页。

② 《汉书》卷 52《韩安国传》，2402 页。

③ 《汉书》卷 52《韩安国传》，2402 页。

④ 《汉书》卷 52《韩安国传》，2401~2402 页。

⑤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4~105 页。

⑥ 《史记》卷 107《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43 页。

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① 可见当时武帝对田蚡之倚重。

第二次廷议之时，政治形势则与两年前大相径庭。前文已述，田蚡等人所好之儒术实为鲁学，鲁学方正保守，延袭“和亲”之策正和其意旨。而就在第一次廷议次年，董仲舒以“天人三策”面圣，汉武帝悦其对，此后遂有独尊儒术之举。不过董氏儒术乃是齐学，而非鲁学。齐、鲁二学相比，鲁学方正，恪守仁义，因循守成，与汉武帝经略四方的政治需求大相径庭。相比之下，齐学崇尚权变，可以灵活地施展其“多欲”政治。此外，齐学的神秘性，亦有利于神化皇权。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齐学的观念给予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更合乎封建统治的需要。^② 尤为重要的是，董仲舒对《公羊传》的“大一统”精神进行了深刻阐释：“《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③ 这正与汉武帝强化集权、强干弱枝的政治需求相一致。由秦始皇于统一六国后确立的君主专制政体传承至西汉，亟待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这一历史重任最终落到汉武帝及其同时代的政治与知识精英的肩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权变”之儒，敏锐地感受到并承担起这一重大的政治使命，在重新论证和树立帝王之尊的同时，一并致力于社会伦理等级秩序的论证和重建。^④ 可以说，汉武帝的政治需求以及齐学的自身特点，共同决定了齐学兴盛的必然性。齐学的兴盛同时又表明此前田蚡所尊鲁学的失误。也就是说，田蚡与汉武帝原本在儒学上的共同意趣，因齐进鲁退而不复存在，田蚡势力集团因此失去了最稳固的政治基石。

尤为重要的是，在接触齐学之后的两年间，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经历了从初具雏形到臻于完备的发展历程。西汉初期以来，西汉王朝通过“册封”以及“和亲”等多种形式构建了庞大的“天下”统治体系，实现了夷夏相安的政治格局。不过这一体系的建立，是以对匈奴的妥协和退让为代价，汉武帝自即位以来，就在思考和探索对既有“天下”秩序的颠覆与新秩序的重建。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以“汉为天下宗”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正是以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于对百越之争的处理过程中初步形成。^⑤ 相比之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是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要旨，是“大一统”思想在边疆层面的理论延伸和践行路径，故而随着“大一统”思想的初步形成，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的框架与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

破除夷夏之辨的理念制约是汉武帝重振“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首要任务，对此，董仲舒基于公羊学视角对夷夏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⑥ “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⑦ 董仲舒把“爱及四夷”视为万国来朝的必要条件和人君的应有之义，夷夏一统至此成为理顺天地阴阳、成就王道的必备前提。在夷夏一统的路径选择上，董仲舒力主德治，反对征伐之举。不过，他同时又对战争在调和夷夏关系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了阐释：“故《春

① 《史记》卷107《武安侯列传》，第2844页。

② 安作璋、刘德增：《汉武帝独尊儒术与齐学》，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

③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4《王道》，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2～114页。

④ 朱松美：《经典诠释与秩序重建——董仲舒如何借〈春秋〉诠释重建政治秩序》，《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5页。

⑤ 李大龙：《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39页。

⑥ 《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3页。

⑦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8《仁义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2页。

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① 在“战不如不战”的前提下，他依然认同有“不义之中有义”的“善战”存在。夷夏观念与实现“大一统”的路径选择一直是汉武帝重建“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两个重大命题，亦是“无为”与“有为”两种边疆主张观点分歧最著之处，前述两次廷议的激烈论争也皆是围绕着这两个议题展开。经董仲舒以公羊学精神的阐发论证，这两个问题终于在理论层面被逐一化解，并最终转化为“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复振的强大动因与践行路径。

第二次廷议之际，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已成大势所趋。尽管王恢韩安国的争论看似集中于具体的战略实施层面，但事实上尤为重要的一点当在于为西汉主动打破汉匈七十余年来和亲局面、大兴征讨之师找寻充分的理论依据，这一点依然可于公羊学理论中寻其门径。据《春秋》庄公四年，“侯纪侯大去其国。”对此，《公羊传》云：“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② 鲜明地表现出对复仇的支持态度。事实上，复仇理论向为公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亦以为：“《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③ 公羊学倡导的复仇理论，经董仲舒的阐发，成为汉武帝重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汉武帝备述匈奴娶汉室宗女、收中原货赂之后依然倨傲无礼、屡屡侵边的罪恶，故发兵击之带有一定的复仇意味。不过此时既已确立以公羊学精神和“大一统”理念来重建边疆思想，那么汉匈之仇自然远不止于此。廷议双方争议中提及自高帝以下包括白登山之战等种种前朝旧事不仅无法作为守旧派固守己见的依据，反而成为汉武帝大兴征讨之师的理由与依据。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时西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汉武有困胡之计，乃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④ 当时已是征讨之策既定三十年后，此时武帝之辞依然彰显出公羊学的复仇精神，其渊薮正在于董仲舒阐释张扬的公羊学理论。可以说，正是在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协作下，通过对公羊学理论的借用与阐发，最终为汉代边疆思想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向提供了坚实厚重的理论依据，汉代边疆经略即将因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而在此期间，田蚡窃弄威权，威福自用，引致了武帝的强烈不满。^⑤ 田蚡失势，意味着坚守传统边疆思想的最后一块阵地正式瓦解，此消彼长，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保守边疆思想的崩溃和“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兴起勃发。以此次廷辩为标志，汉武帝一朝新的“有为”边疆思想从此正式确立，也预示着西汉边疆经略的指导思想即将完成由“黄老无为”到“王者无外”的历史嬗变。

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2《竹林》，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③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4《王道》，第117页。

④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7页。

⑤ 据《史记》卷107《武安侯列传》：“（田蚡）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库！’是后乃退。”（《史记》卷107《武安侯列传》，第2844页。）

四、结语

总的来说，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复振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内忧解除，亟待解决匈奴的边患问题，是促使边疆思想“有为”化转向的现实基础；汉初的儒学复兴，“大一统”思想在族群观层面的延伸则成为前述两种思想嬗递的关键性理论因素。如果说文景之际，“有为”化边疆理念尚处于早期孕育阶段，那么至汉武帝时期，革故鼎新的内外部因素均已成熟，西汉国力的恢复，夷夏之间矛盾的激化，以及汉初的儒学复兴，最终都转化为动摇“黄老无为”思想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推动着汉代“有为”边疆思想的形成与确立。不过汉武帝对“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重建，最终还是以董仲舒的公羊学理论为支撑方得完成。董氏公羊学通过对“爱及四夷”以及“善战”观念的阐发论证为夷夏一统和武力征伐找寻到理论依据，并借助复仇理论为汉武帝主动打破持续多年的和平时局、开创边疆经略新时代提供了有力佐证。就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深刻思考和反复求索中，“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重振已然呼之欲出。以元光二年聂壹上言击胡为契机，“王者无外”对“黄老无为”的取代进入到最终论证阶段，汉代边疆思想的破旧立新经此前多年的孕育积淀，迎来了至为重要的十字路口。面临廷议双方的唇枪舌剑与激烈争辩，汉武帝圣心独断，以公羊学的精神为引领，以“大一统”思想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完成了边疆思想与边疆经略的重新建构，推动了新旧思路的演变嬗递，并积极推动其从理论层面向边疆实践的现实转化，汉武帝朝波澜壮阔的边疆“大有为”时代遂由此开启。

本文作者：袁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龚赛红

The Motivation and Path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rontier Thought of “Wangzhewuwai”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Yuan Baolo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frontier thought of “Huanglaowuwei” (letting things take their own course)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It had become a demand of the times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new and promising concept of borderland, no matter based on the reality or theories. After the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frontier though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the time for its evolution was rip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Emperor Wu and Dong Zhongshu became the two key figures to promote the final completion of the evolution. Dong Zhongshu's reformed New Confucianism theory provided the basic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rontier thought of “Wangzhewuwai” (the king's prestige and benevolence have no boundaries), and a series of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uzzles such as the long-standing interaction between Yi and Xia were solved. Emperor Wu judged the times and the situation, and had a spirit of beneficial arbitrary. With the positive trend of new Confucianism, he constructed the frontier ideological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and strengthened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foreign affairs, thus opening the era of great achievements on the frontier issues in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 “Wangzhewuwai”; frontier thought; reconstruction